热点透析

恐怖主义为何向欧洲蔓延

□ 白　洁

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法国总统奥朗德谴责这一暴行为“新形式的战争”，媒体则称之为欧洲版“9·11”事件。巴黎系列恐袭案是继今年初巴黎《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发生在欧洲的又一次重大恶性恐怖事件。英国、意大利等欧洲一些国家也受到威胁，声称对此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国”一位头目甚至放言：“总有一天我们将占领欧洲！”

巴黎恐袭事件与俄罗斯飞机埃及空难、黎巴嫩恐袭仅相隔数日，对欧洲形势和国际局势造成了巨大冲击。当前，全球恐怖活动呈蔓延趋势，欧洲则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人们不禁在问，为什么欧洲成了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

乱源之始：中东

地缘政治学中经常提及一条“伊斯兰弧”，指从北非到中东、西亚直至中亚和南亚乃至东南亚这片居住大批穆斯林的区带。多年来，这条弧线上的中东地区热点频发。如今这里危机频仍，不仅是欧洲难民潮的集中来源地，也成为最大的恐怖主义策源地。

巴黎系列恐袭事件与中东乱局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欧洲与中东及北非地区地理相近、地缘相连，人员往来密切。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埃及西奈半岛已经成为恐怖活动中心，恐怖主义向外蔓延的第一站就是欧洲大周边地区。对此，有德国媒体称，长期以来，欧美低估了中东失序和动乱的危害性，单靠加强援助难民，加强欧洲外部环境已不足以应对这一威胁。

近期，俄罗斯、美国加大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使恐怖主义势力在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地面力量受到沉重打击，开始从军事行动转向有计划地对欧洲及其周边频繁实施恐怖袭击。英、法等欧洲国家高调介入中东事务，在外带头参加美主导的反恐联盟，对内加大反恐力度和对穆斯林人群的监控，由此成为宗教极端势力的眼中钉。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01年“9·11”事件后，欧洲多国配合美国行动，派兵参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一政策招致伊斯兰极端势力报复，相继发生了西班牙马德里和英国伦敦连环爆炸案。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中东与欧洲恐怖组织网络相互勾连的“叠加”效应。全球化时代，国际恐怖组织在全球各地发展秘密据点，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协调行动，招兵买马，构建跨国跨区域的恐怖主义网，推进极端思想在全球扩散传播。另外，全球恐怖主义与本土恐怖主义沆瀣一气，产生了巨大破坏力。“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在发动“输入型”袭击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本土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在“伊斯兰国”崛起之时，不少欧洲极端分子赴中东参战，相当一部分已经回流本国并继续与极端恐怖组织相勾连。本次巴黎恐袭事件就是中东策划、本土实施、多点爆发的典型案例。

内患之忧：欧洲

近年来，欧洲承受着乌克兰、债务和难民等三重危机的打击，巴黎恐袭不啻雪上加霜。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民众不安全感骤然上升的同时，也在反思恐袭中的自身原因。

首先，欧洲经济的连年不景气，激化了欧洲社会的各种内部矛盾。欧洲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底层处境更加艰难，特别是欧洲的穆斯林人。而法国部分地区穆斯林的青年失业率高达七成以上。受经济困境和前途无望等因素影响，欧洲穆斯林的失落感和不满增加，与主流社会的对立上升，矛盾进一步激化，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其次，欧洲社会近年来的文明对峙和排外主义上升，刺激和伤害了欧洲穆斯林。近年来，西方连续发生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事件，《查理周刊》事件的发端就是刊登了此类“大不敬”的漫画。欧洲国家限制建造清真寺等针对穆斯林政策，引发当地穆斯林抗议和反弹。中东和北非穆斯林大量涌入，引发欧洲排外民族主义情绪、极端右翼势力力借机扩大影响。一些伊斯兰宗教势力也针锋相对，煽动欧洲穆斯林对政府和社会仇视。

再次，欧洲在警力、安防和反恐情报方面防备相对松懈，给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作为恐怖组织的首要袭击目标，美国近年来不断提升本土化安全。随之产生了“挤出效应”，迫使恐怖组织将重点转向欧洲。较之于美国，欧洲申根条约成员国实行边境开放，人员自由流动，来自中东、北非难民和移民中混入不少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加之欧洲各国安全监管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有效的边界管理，就为恐怖分子策划实施恐怖袭击提供了便利。

反恐前景：并不乐观

巴黎袭恐事件案发于欧洲中心城市，对法国民众及世界人民心理造成极大冲击，也拉响了欧洲和全球反恐警报。目前，事件后续影响仍在发酵中，欧洲国家深切意识到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也有志于凝聚社会共识、加强反恐能力。但是，欧洲反恐形势面临着不少问题。

反恐会不会“越反越恐”？法国誓言将进行反恐战争并将彻底消灭“伊斯兰国”，而极端恐怖组织则扬言要发动更多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随着“伊斯兰国”遭受军事打击压力上升，其武装分子“化整为零”，在域外国家制造更多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据报道，来自欧洲的“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约3000人。这些人如果回流到欧洲，将成为可能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他们凭借身份、语言、熟悉环境等优势，令欧洲警方防不胜防。

反恐政策协调不易。欧盟内部任命了反恐协调员，但主要反恐力量仍集中在欧洲各国政府手中，各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评估不同，在情报交流上仍存在顾虑，在如何分担反恐资金方面意见不一，在统一行动上更是各有打算。

反恐可能引发更大难民潮。巴黎事件后，欧洲社会愈发谈“伊斯兰”色变，穆斯林和主流族群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右翼保守势力更加得势，社会反移民政策呼声不断提高。这导致欧盟内部寻求统一难民政策难上加难。波兰候任欧洲事务部长就表示，鉴于恐袭事件后的新局势，波兰不可能按照欧盟配额标准接收难民。德国、瑞典等主要难民接收国因内部社会和政治压力上升，极有可能收紧现有的移民政策。反之，欧洲在难民政策问题上的调整，又会加大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等国原本就不堪重负的难民压力，引发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此外，欧洲反恐升级将与中东地区局部冲突之间产生某种联动关系，其“共振”和叠加效应将更加明显，对全球反恐及欧洲、中东地区形势发展带来更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和变化。

反恐合作：多管齐下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反恐将成为欧洲社会最大的关切和压倒性议题。是否能在短时期内对恐怖主义势力实行有效遏制，将对欧洲安全形势和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欧洲各国已紧急提升安全级别，强化安保措施，并加大反恐投入，在加强监视、收集公民数据、强化边境管理方面正准备出台更多措施。例如，法国宣布今后3年将在反恐方面投入超过7亿欧元，严厉打击美化恐怖主义的言行。英国安全情报部门加大了对人员和技术投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派了1900名安全及情报人员，赋予了情报机构更大的信息追踪权，还强化了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监控。欧美也商定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和情报交流。

反恐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斗争，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运用军事安全等综合手段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现实紧迫威胁。也要看到，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复杂原因，仅靠军事打击和安保措施可能治标，但难治本。从长远看，需要从源头上入手，妥善解决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大力改善有关国家经济民生，化解社会矛盾，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也需要广大伊斯兰世界采取切实措施，倡导包容温和的宗教思想，正本清源，剔除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疏导，防范出现文明冲突和“以暴制暴”。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另眼看世界

日本加入TPP谈判前夕的国内大争论

□ 加藤嘉一

“我担任议长的APEC首脑会议上将建立与美国、韩国、中国、东盟、澳大利亚、俄国等亚太诸国共享发展与繁荣的环境。作为其桥梁，EPA（经济合作协定）和FTA（自由贸易协定）很重要。作为其一环，我们将考虑参加环太平洋经贸协定（TPP）谈判等，努力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圈。着眼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实现，开放国家，尽量推进具体的谈判。”2010年10月1日，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时这样表述。此前7个月，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发起的TPP开始谈判。

在笔者的印象中，民主党在日本政党政治史上首次以政权交替的形式夺得政权（2009年9月）后一年多的时候，正是日本国内掀起TPP大争论的开端。随后，无论是政治家、政府部门、经济学家、企业家，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于“日本是否参加TPP”的立场与看法以比较快的速度和动荡的氛围形成TPP“推进派”与“反对派”。

一开始，民主党内关于要不要参加TPP的立场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2010年10月24日，菅直人召开关于TPP的“集体学习会”，让所有阁僚务必参加。从保护国内农业和农产品的角度倾向于反对TPP的农业水产省大臣鹿野道彦主张“强行推进TPP，内阁要倒下去”。对此，把TPP视为仅次于明治维新和太平洋战争战败之后的“第三次开国”的官房长官（内阁里的二把手）仙谷由人反驳说“如果往后退，内阁就要倒下去”。两者之间的立场形成完全的对立。菅直人只好总结说“我们要认识到，如何处理10年后的农业和内阁高举的‘开国’，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2011年3月，经济产业省的精英官僚中野刚志在其出版的《TPP亡国论》（集英社）中主张：TPP的实质是把日本的市场出卖给美国；所谓自由贸易不仅不带来出口的增加，反而引起通缩和就业的进一步恶化，对日本经济毫无好处；从医疗到金融、保险、食品安全等，国民生活将崩溃，等等。

该书作者是负责TPP政策之部门的在职官员，虽然其时日本还没有正式表明要参加谈判，却不难看到TPP在日本政策界与舆论界的争议性有多强烈和深远。从此开始，“TPP亡国论”成为了颇有影响力甚至杀伤力的“流行语”。

对于来自“官方”的“亡国论”，在与经济、能源等领域的大众、网络舆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池田信夫在自己的博客上进行了反击（2011年4月29日）。他主张说：“该书的作者主要提出两点：一，TPP实际上是与美国的FTA；二，TPP将带来进口的增加，这将导致通缩。关于一，TPP实际上等于日美FTA，有什么不好吗？作者就是从陈旧的保守主义措辞而已；关于二，贸易自由化导致进口额下降属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不是货币上的通缩。”

池田认为，TPP的关键不在于中野使用大量的篇幅说明的农业问题，而在于金融、电信等服务贸易之自由化，以及就业、环境等规则的国际标准化。日本的服务业始终被复杂的管制保护着，其劳动生产力很低。废除保护，并实行国际化标准是很重要的。

11月上旬，隶属于《日本经济新闻》的Nikkei Business Online做了一个专题叫“TPP亡国论的谎言”，邀请各界的“推进派”讨论日本为什么要推进TPP。其中，农业水产省前事务次官（官僚的一把手）高木勇树说：“过去，我们省对农业的保护方法是错误的。根据我省的试算，若日本参加TPP，农业生产额将减少4.1万亿日元，但实际上过去20年该额减少了4万亿，农业所得减半，……这样下去，日本农业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并主张把加入TPP作为振兴农业、改革农业的战略契机。

2011年11月11日晚，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在位于东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表明：“着眼于参加TPP谈判，我国将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并表示在由次日开始的夏威夷APEC会议上向美国奥巴马总统等TPP有关国家的政府首脑传达日本的立场。当天晚上，对参加TPP谈判持有反对态度的农业水产省大臣鹿野道彦对记者表示“首相没有表明参加，我的理解是，他没有把参加谈判当做前提”。

根据2011年11月12日和13日朝日电视台实施的舆论调查，支持野田内阁的有39.5%，不支持的有29.5%，不好说和不回答的有31%；支持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有45%，不支持的有32%，不好说和不回答的有23%；另外，认为参加TPP将成为振兴日本农业的契机的有37%，将打击日本农业的有27%，不好说和不回答的有36%；认为为了发展日本经济，认为需要扩大自由贸易的有62%，不认为的有15%，不好说和不回答的有23%；最后，关于日本参加TPP谈判，认为野田首相为解释得清楚而做出努力的有9%，不认为的有78%，不好说和不回答的有13%。

由此可见，在日本还没有正式参加TPP谈判的环境下（后来，日本正式表明参加TPP谈判的是执政权回到自民党、安倍晋三内阁时期的2013年3月15日。而TPP谈判告一段落，12个参与国之间达成基本共识的则是2015年10月5日），公众对TPP整体上还是看好的，也把它视为有可能振兴日本经济的一个契机，但同时要承认的是，来自官方的信息和说明之不足，导致公众始终看不清它究竟给日本社会和百姓生活具体带来什么，其中的得和失分别是什么。这一情况持续至今。

2011年，笔者在东京参加了几场关于“日本要不要参加TPP?”的讨论会，均有企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等参加。总体的感受是，推进派和反对派的比例为6∶4到7∶3。来自经济相对落后，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方，从事农业、医疗等人士基本表示反对，其主张趋于情绪化，抱怨说“TPP要把我们弄死”；而推进派则比较团结地主张TPP是日本推进“改革开放”、让祖国高举“平成维新”这一第三次开国的战略需要，不可回避，只好向前。

当然，与此同时，TPP毕竟是日本的最大盟国——美国在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的语境下强有力推动的战略产物，关于这一点，不管是日本的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很清楚，愿意也好，无奈也罢，战后日本的发展与日美同盟密不可分，是无法摆脱的。

（作者系日本学者、专栏作家）

缅甸政府更迭下的内政外交

□ 宋清润

11月8日，缅甸举行大选，选举产生联邦议会和省邦议会共1100多名议员（联邦和地方议会25%的议员是军人，其余75%为选举议席）。根据选委会公布的计票结果，昂山素季领导的最大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不仅在联邦议会人民院和民族院赢得过半席位，在14个省邦议会也占据主导地位，而军人支持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惨败，议席数仅占联邦议席总数的6%左右，其他小党议席数更少。

根据选后政治安排，2016年1月新议会将召开首次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人民院议长和民族院议长，2月，联邦议会将选举产生新总统和两名副总统，总统再组建政府。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民盟领导的政府将从2016年3月起执政5年。然而，缅甸政治生态复杂，也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民盟执政未必一帆风顺。中缅友好关系将总体向前发展，但存隐忧。

大选特点鲜明

第一，从举行时间上来看，这次大选是按照宪法规定期限举行的。缅甸1948年独立以来的大选，没有几次是规律的。比如，1990年大选和2010年大选间隔20年。而今年大选则与上次大选正好相隔5年。第二，民众投票踊跃，本次大选投票率高达80%，创了缅甸大选记录。因为，此次大选被各方寄予厚望，会给缅甸带来极大改变。第三，这次大选的参选政党是91个，是上次大选的两倍半。这次大选的议员候选人6000多个，是上次大选的近两倍。大选共有1万多名的国内外观察员监督大选。这些都是创了历史纪录的数字和事件。第四，大选公正性获得国内外基本认可。欧盟等西方观察员公开表示，大选基本是自由公正的，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改善之处。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向缅甸总统吴登盛致电，祝贺“缅甸历史性的大选取得成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多国领导人也对缅甸大选平稳举行表示祝贺。

民盟执政前景：喜忧参半

强大的民意支持。联邦议会的很多委员会的负责人将由民盟议员担任，14个省邦议会的运作也基本将由民盟主导。民盟还将主导联邦议会人民院议长和民族院议长，主导总统候选人，主导总统提名的政府部长人选。民盟将主导新议会和新政府。大选前后，昂山素季和现任军政高层均展示出了难能可贵的和解、合作姿态，这对未来新政府的组建和新旧权力交接至关重要，实属缅甸之幸。昂山素季大选前后多次强调自己是昂山将军的女儿，与军队感情深厚，愿与军方合作，并邀请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总统吴登盛、联邦议长吴瑞曼举行有关国家和解的会晤，称要组建“和解政府”。而敏昂莱表示，将尊重大选结果，不会让“1990年军方否决民盟胜选结果”的事件重演，他将会与昂山素季和民盟合作，应昂山素季邀请参加高层政要有关国家和解的会晤。总统吴登盛对民盟胜选表示祝贺，承诺将在2016年3月本届政府届满时向新政府移交权力。

然而，民盟未来5年执政，挑战也不少。

第一，昂山素季亡夫和儿子是英国人，不符合宪法的总统任职资格条款，但她强调“将在总统之上”，新总统将没有权威，按照民盟政策施政，她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可做出所有决策，无论谁当总统，她要“主政”。有人认为昂山素季言论违反民主原则和违背宪法。第二，缅甸面临着诸多复杂难题，而昂山素季和民盟长期在野，缺乏执政经验：政府军和多个民族武装的冲突仍在继续，佛教徒与罗兴亚人（穆斯林）的矛盾尖锐，经济落后，缅币贬值，农村贫困，贸易赤字，教育滞后，罢工迭起，等等。民盟从未在某个省邦执政过，其核心领导层多进入古稀、耄耋之年，又未重视中青年骨干的培养。有人担心民盟缺乏足够治国人才，未必能管理和发展好国家。第三，民盟核心成员同患难27年，此次大选后终于有望执政，面对着巨大的政治利益及其附带产生的经济收益以及其他诱人利益，民盟内部若因执政收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势必影响执政。第四，在政见和利益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下，昂山素季和军方未来发生利益摩擦乃至冲撞的可能性仍在。昂山素季和民盟一旦执政，推进民主化的速度必然更快，力度更大，其一旦再提修宪，用司法和行政力量削减军人权益，削减军费，整顿军人企业等，势必引发后者反弹。

外交：势必继续推行“大国平衡”，对华总体友好

昂山素季和民盟与西方关系密切，她在民盟胜选后，与西方多国驻缅使节、记者等会晤，希望西方政要尽快承认民盟胜选结果，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尽快访缅并向其祝贺，用国际支持来进一步提升她和民盟的声望，向缅甸军政当局施压，确保后者顺利向民盟交权。民盟未来若执政，必然积极发展与西方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缅甸就会倒向西方，也一般不会像有些国家那样配合美国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其总体也会延续缅甸长期以来的“大国平衡外交”策略，在大国间左右逢源，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为，缅甸是中南半岛第二大国土面积国家，封建时期曾是地区强国，但近现代又遭受英、日殖民统治，其民族主义情绪强烈，高度防范大国控制。缅甸上世纪50年代与中国、印度等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抵制美苏两大阵营的威逼利诱，独立自主，不“选边站队”。从缅甸历史发展、民主主义情绪、外交原则等因素综合分析看，昂山素季和民盟执政首先是维护缅甸国家利益，对美国未必完全言听计从，不会让美西方国家主导缅甸发展。一些国际媒体也认为，昂山素季和民盟未来若执政，其也会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会与美国、日本等“结盟”而制衡中国。

昂山素季和民盟对华总体友好。2015年6月，她率团访华，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她表示，“缅中是邻居，而邻居不可选择，致力于两国友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民盟重视缅中友好，钦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希望通过此访深化两党关系，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向前发展”。大选后的11月17日，昂山素季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缅甸将继续执行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视与邻国的关系，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中国在缅有很多投资，缅甸在中国“一带一路”推进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发展需要缅甸支持。而缅甸发展也需扩大对华合作，走互利双赢之路应是缅甸未来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取向。西方经济整体低迷，其投资和市场对缅经济的拉动作用尚远逊于中国，而中国是缅甸最大外资来源国、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顺差来源国、最大工程承包商和重要外援国。缅甸发展整体仍较落后，缅甸未来发展需要扩大对华合作。不仅如此，中缅两国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国—东盟自贸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多边框架下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毋庸讳言，缅甸领导人和政府的更迭势必改变国家政治格局，势必有与前政府不同的施政方式，难免对中缅关系带来些许影响。第一，缅甸民间反对前军政府的情绪滋长，一些人提出重新审核前军政府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这些非理性民意会否迫使缅甸新政府做出相应举措？会否影响中缅经济合作？第二，民盟若执政，美国或解除大部分对缅制裁，整个西方世界也会以增加对缅投资和援助，势必会对中缅全方位合作形成更强有力的竞争。

环球瞭望